

人则认为他“利欲太重”、“不讲义气”，因而对他早存不满，并直接减少他的随从，调离他的亲信，使孙其昌难以忍受，于是与星野直树一度闹翻了脸，随后不久便被赶出了“肥缺”部门。

孙其昌虽然身居“闲职”，但尚能利用已得到的优厚待遇，继续过着奢侈、舒适、消闲的生活。然而，这种情况并不长久，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的傀儡生活也宣布结束。这时，他通过亲朋掩护，逃脱了苏联红军的逮捕，先后躲避于长春、沈阳与北京等地，直到1951年2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1954年将其处死。

伪吉林省长徐家桓的几件事

张清

一、留学日本

徐家桓字纯熙，满族镶黄旗人。1892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金家乡（现金家满族乡）任家村徐家屯。曾祖之前，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他父亲叫徐振瀛，是个有名的中医，此时家境稍宽裕，家有土地10余垧。清朝末年他曾在私塾读书5年，后入吉林北关小学读书。辛亥革命后，他考入吉林一中读书。当时中国政府正大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主要是向欧美和日本等国派出。当时派遣留学生有省费和县费的区别，两者都属于公费，只不过省费要比县费留学生的待遇丰厚些。当时按考试成绩录取，优秀者享受省费待遇。

1914年，徐家桓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省费留学生，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电气。

中国留学生到日本，要先在预校补习日语一年，然后才能入大学。电气系属于理工科，他在国内中学尽管是上等生，但当时中国的教育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日本学校制度特别严，考试成绩不及格，必须留级。由于学习负担重，他升入四年级时，终于累出了病，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好停学治病。在患病期间他没回国。他父亲得知这一消息，问明了病情，带着一些中西药亲去日本。由于中西药兼用，又加休息治疗，逐渐恢复了健康。

半年后，又重新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由一年重新学起。这样，他在日本读了两次大学，共学习了11年。

二、两朝为“官”

徐家桓在日本读书的后期，便结识了少帅张学良，并为张学良充当翻译，陪他到日本各地访问，因而深受张学良的赏识。

1925年徐家桓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回国。当时正是国内军阀割据，奉系军阀得势之时，也正是张学良广泛招贤纳士之时，于是他就投靠了张学良。当时张学良手下有上百名的副官，徐家桓自然也就成了一员副官了。

当时张作霖正在北京任大元帅，控制了关内北方数省，显赫一时。张学良发现徐家桓才华出众，不仅懂得古文，善书法、通典律（学法的），而且还会英日两国外语。于是经张学良的推荐，1926年张作霖把他派往河北省昌黎县任县知事（县长）。

1928年张作霖在北京失势，势力范围只限于东北三省。徐家桓被调回奉天省（今辽宁省）本溪县任知事，1929年改县知事为县长，直到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

本溪县被日军占领后，徐家桓携家迁回吉林。1932年初，经吉林教育会长徐鸿泽推荐，任吉林一中教务主任。

伪满洲国成立时，各地方政府大量缺员，到处请人参政。因徐家桓是日本留学生便想将他拉入政界，他也正有意投敌，遂于1934年出任吉林市筹备处处长。任职期间，逐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于1936年任吉林市第一任市长。

1940年伪满洲国又新增设四平市（相当于今天的四平地区），调他为四平市首任省长。

1942年调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1944年初，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已明显不利于日本。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以当地人统治当地人”的欺骗政策，调他回吉林省任省长“特任、勋三位”（日伪的官职级别），直至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

三、挪坟“盛况”

1945年5月9日，德国法西斯已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处于独立无援的地步。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傀儡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这一局面，为当时世人的共同看法。身居要职的徐家桓，对时局的演变尤为敏感。

他急于在伪满洲国垮台之前，将他故去多年的父母灵柩，埋葬在一起，以了却他的一份心愿。于是选择了他的家乡金家乡莲花村红土洼子的一块地。

合葬日期，选于1945年5月下旬某日。先从吉林郊区将其父亲灵柩运回，翌日，他又率领部分较近的宗族和亲友到金家乡何家村大背将其嫡母（不是徐家桓的生母，是徐振瀛的第一个妻子）的灵柩运回红土洼子。

去大背这一天，有伪满岔路河警察署署长警佐吴克家率一名警尉和一名警长担任护卫。当时农村没有公路，村公所征集附近农民在乡道上垫上黄土黄砂，加以修整。除徐家桓乘坐的

四周用布帘围遮的四轮小车外，其余是十几辆铁车。当大队返回金家村时，伪金家警察分所、金家村公所、协和会等全体工作人员列队迎接。时已中午，事前村公所早已为徐家桓一行准备了午饭。大队人马一到，立即将徐家桓及其随行亲友让至村公所办公室。办公桌成了筵席桌，工作人员成了服务员。共设10余桌，每桌十几道菜。按当时的钱币计算也得几百元。费用全由当地负责，村公所职员一个月工资才20元钱，这些钱都是当地老百姓的血汗。

修整黄土乡道时，村公所征集了数百个民工、几十辆大车，一连修整了数天，仅仅是为了徐家桓迁坟所用。

合葬的前一天，来参加葬礼的有数百人。其中主要人员有伪吉林省公署各厅长，永吉、九台等邻近各县长，以及军、警、各官署的官员，各村公所的职员，各保的“绅士”等等。真可谓“宾客盈门，车马络绎不绝”。

参加葬礼者多半赠送挽联（绸缎制成）、烧纸和“碑文”（用秫秸扎成碑状，外糊写白字的黑纸），还有的送“纸扎活”（纸人、纸马牛等）和花圈。

当时徐家桓面带愁容，时常掉泪，这实乃借祭父母亡灵之机，抒发自己内心对前途命运之忧思。记得在坟前还立一大石碑，写着“祭而丰不如养之薄”等句。此碑在土改时被当地农民推倒摔断。

四、两次自杀

1945年9月3日，苏联红军进入吉林后，召集伪满吉林省公署人员开会，当即将徐家桓逮捕，送到苏联远东伯力战犯收容所。这时苏联红军驻吉林最高官员是格罗达塞夫中将。

徐家桓在伯力关押三个月后，经联保提前释放回至吉林市。

1946年春将家迁至长春市二马路。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长春市。这时他内心十分害怕，虽然被苏联释放回来，并没有给他释放证。这时国内形势又不稳定，他是一个学法律的，他自认为：如果国民党掌权，他还有被宽恕的希望，但局势发展，已有利于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掌权，是不会宽恕他这个大汉奸的。

1946年秋，他去了北平，改名马希援。不久在北平实业公司就业，当了职员。1947年春，他把家也迁至北平，他儿子徐洪杰改名为马洪杰。

北平解放后，实业公司改为北京啤酒厂。他在厂内一举一动非常谨慎。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人检举了他。在这时他也听到伪满时期他属下的一个县长，已被政府判处死刑。这一消息对他震动很大，当时他虽然表面上故作镇静，但内心充满了恐惧。

1951年6月的一天，徐家禧从北京啤酒厂的楼上摔了下来。厂子领导和工人们都认为他年纪大失足坠楼的。工会有关人员和工人们到医院看望他。也奇怪，他从六层高楼跌下，并没有摔死，只把胳膊骨上节摔折。二十多天后基本痊愈。在出院之前，他主动找啤酒厂领导交了他隐瞒的历史问题。厂领导立即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来了一名干警和厂方一名领导到医院向他交代了党的政策，并让他好好养病。又过了几天出了院。

他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家里人看他的精神已基本稳定，伤势已经好转，便放松了警惕，没有专人看护。7月30日这天，他叫他老婆外出买烟，然后又让他儿子去接。他一人在家关了门，倒栽在盛满水的大水缸中自杀而死。时年59岁。

隔不多天，啤酒厂贴出一张布告，内容大体是：“伪满吉林

省长徐家桓，化名马希援，隐瞒历史，混入厂内，现已畏罪自杀，给以开除厂籍……”从此，徐家桓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摘自《永吉文史资料》）

伪间岛省长李范益

常德

李范益，朝鲜族，1883年生于朝鲜忠清北道丹阳郡丹阳面下防里。1903年任外语学校教员，后任农工商书记官和春川、金泉、达城、醴泉、漆谷等郡的郡守。1923年后历任朝鲜总督府事务官、黄海道内务部长、庆尚南道参与官、江原县知县、忠清南道知事等职。1935年任中枢院参议、东洋拓殖会社监事。1937年7月入中国东北，11月被伪满政府任命为间岛省长。他是伪满时期第一个朝鲜族省长，也是伪满朝鲜族官吏中官职最大的一名。

伪间岛省是朝鲜族、汉族等杂居的边疆地区，也是朝、汉族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活跃的地区。李范益到任后，继续实行前任省长日本人金井章次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与伪满中央各部门密切配合，狠抓了所谓“维持治安”、朝鲜移民以及经济资源掠夺，思想奴化等工作，不断强化法西斯殖民统治。其主要施策及实施情况如下：

（一）扩大警察力量，加紧对抗日武装及民众的围剿和迫害。除继续执行金井章次时期制定的伪间岛省自1936年4月至1938年12月的三年肃正计划，派出警宪、自卫团，配合日伪军队对安图、抚松、汪清、琿春、东宁等地的抗日武装进行围剿